

李佩在中国劳动协会的岁月

石绍庆



李佩

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的李佩，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的夫人，其最令世人熟知的是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英语教授，开辟了中国应用语言学的新领域。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风云变幻之际，李佩便在中国劳动协会（以下简称“劳协”）参与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等诸多进步活动。

在劳协，开始接触共产主义

1936年，李佩考入北京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李佩也辗转至西南联合大学，在校期间曾担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

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于1942年到劳协工作，主要从事劳工福利与国际联络工作，后来担任了劳协负责人朱学范的英文秘书。抗战期间，以朱学范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抗日而努力，并加入国际工人联合会。

1942年，美国工会决定每年向中国、英国和苏联工会提供捐赠，以改善抗日战争中的工人生产生活条件。劳协利用这笔捐款，在重庆开设多所工人文化学校，举办工人福利社、诊疗所、托儿所等，李佩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与使用。

由于李佩当时负责美国工会对华捐款的使用，得以和驻重庆的中外记者经常往来。这其中，就有新华社记者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1942年春天，龚澎生病住院，李佩到院探望，从此两人成为朋友，开始在工作上有所接触，并有机会出入于曾家岩的周公馆，开始为国共合作抗日而努力。龚澎见李佩对解放区工会的事情感兴趣，便把《西行漫记》介绍给李佩，对李佩了解中国共产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李佩曾说：“我读后对共产主义有了了解。”

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彼时正在重庆担任新华社日报社国际新闻主编，主持国际专栏，经常以笔名“乔木”在《新华日报》发表每日评论，其中有讨论共产党代表是否应该参加国际劳工协会的文章。有一次，龚澎和乔冠华前去拜访李佩。在获悉乔冠华就是“乔木”时，李佩便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诸如：解放区的工会是什么样的？邓发在共产党内是做什么的？乔冠华都一一作了细致的介绍。在龚澎和乔冠华等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李佩积极协助将美国工会的部分援助款送给了解放区工会。

陪同朱学范与邓发参加世界工联大会

1945年9月25日至10月3日，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成立世界工会联合会。李佩以朱学范英文秘书的身份一同参加了此次大会，并结识了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邓发。

当时，国际舆论和劳协都非常希望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会议，经过竭力争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邓发出席。临到出发时，邓发来不及与朱学范等人汇合。朱学范

考虑到邓发对出国情况不熟，担心发生不利的事情，便安排李佩沿途等一等邓发。

邓发从重庆飞经印度加尔各答，计划转机前往伦敦时，因故等候多日未能成行。9月23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张晓梅致函劳协常务理事兼书记长易礼容，希望劳协设法保障邓发顺利抵达欧洲。易礼容立即安排，并向邓发、朱学范与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分别发了电报。在给邓发的电报中，易礼容写道：“学范来电，请你速赴巴黎。关于赴英机票，请与中国领事馆洽商。我将再电中国领事馆协助。李佩在伦敦等你。”经多方努力，邓发于9月30日飞抵伦敦。

此时，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朱学范便通知李佩先期离开伦敦，在巴黎等待邓发。10月3日，李佩在劳协驻巴黎的旅馆第一次见到了邓发。见面后，邓发要求立刻前往会场。李佩对巴黎街道不熟悉，便提出乘出租车前往。邓发说：“我们搭地铁的车去吧！在莫斯科，我就常搭地铁的车。不要怕，跟我来。”原本朱学范安排李佩留下是为照顾邓发，此刻却是邓发带着李佩前往会场，此事令李佩感到些许不安。

10月4日，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转入世界工联第一届代表大会阶段。邓发在会上作了发言，他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宣布了战后中国工会的八项行动纲领，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由于大会没有中国语与外语的同声传译，朱学范便安排李佩将邓发的发言现场翻译成英语。会后，李佩还与朱学范、邓发、陈家康一起到印度参观六浦海员工会，到马尼拉访问并接见了华侨代表。

此番赴法参会，李佩得以与邓发长时间接触，加之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报纸，使她加深了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对什么叫进步、工人运动最根本目的是什么、工人运动与政治的关系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曾谈道：“在与邓发的接触中，对解放区的了解比之过去从《新华日报》上和共产党的一些工作人员中知道的清楚多了。”他的一些话，至今仍在我耳边萦

梁之材。他不但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又创办了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体系，造就了私人建校史上绝无仅有最完整的一个案例。

张伯苓以抗日救国为缘由建校，在教学中更是以抗日救亡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以各种方式和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张伯苓不但发表名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爱国演讲，还对东北籍的学生一律减免生活费，学费缓交；凡因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南开一律向其敞开大门，助其完成学业。

绕，启发我的思想觉悟，教导我如何认识问题，指引我找到了正确的生活方向。”

为解放区妇女争取权益

在巴黎期间，恰逢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发起召开国际妇女大会。由于时间仓促，且国民党政府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中国驻法大使馆临时指定李佩与李惠年、李献敏、潘玉良、姜淑寰等10位旅欧妇女、女学生组成中国代表团参会。

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很早就注意到即将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发护照，未能如期参会。此次大会成立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常务理事理事会，李佩和姜淑寰二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国代表。理事成员中国占八个席位，其中解放区妇联占三席，两位为正式理事，一位为候补理事。

李佩在发言时，特别向主持人声明，因为没有中国解放区的妇女代表参会，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中国代表团不能代表全中国妇女。回国后，李佩及时将大会文件和有关电报送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帮助中国共产党了解大会情况。1946年4月，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提出候选人，由各解放区妇女团体选出蔡畅和邓颖超为正式理事，丁玲为候补理事。

《职业妇女》杂志社曾在劳协工人福利社对李佩进行过专访，李佩独有的气质迅速将记者吸引，报道中不乏溢美之词：“正如国际妇女代表们给她那许多真实的夸奖，李女士充分表现了中国崭新时期的一个女青年，已经有了四年多劳工福利行政的经验，使她看出十分结实而又亲和。”在提及当选国际妇女民主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代表时，李佩谦虚地表示：“将来我们国内如果另选出了人选，我们必须让他们与我自己知道，对于这样重大的使命，实在是嫌年轻，丰富的经验才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这次很希望我们的妇女界真正能够联合一致推选出一个很好的代表来去参加。”她还呼吁国内妇女界要对此次大会“有一个有力

的反应”，采取实际行动提高我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地位。

与反动派作坚决斗争

回国后，李佩在不同场合介绍了出国参会情况。1946年2月7日，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与中央团部女青年处举行茶话会，李佩受邀在会上介绍了出席世界妇女大会的经过情形。2月20日，劳协召开座谈会，李佩主持并介绍了参加世界工联会议的经过、讨论的各项议程等内容，会议记录由俞平伯的女儿俞欣负责。

此时，国内形势已与出国前发生巨大变化。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隆重集会。2月9日，朱学范主持召开了劳协参加集会的注意事项，李佩与易礼容等均参加了会议。易礼容特别向大会组织者提醒国民党反动派准备破坏大会，要殴打民主人士和劳协工人。李佩坚决地说：“我们刚刚发表了23条对时局的主张。明天的大会，明知挨打，我们也要去。”

大会当天，李佩稍晚于劳协的队伍到达会场，刚到会场，就碰见一位塔斯社记者朋友，打过招呼后，二人便站在一起，没有继续往前走。就在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殴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人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这就是著名的“较场口血案”。会场发生混乱时，反动派看到李佩与外国记者站在一起，没敢继续行凶，李佩幸而躲过一劫。李佩曾回忆说：“较场口那次比较危险。发生惨案时我在场，那次郭沫若等人都挨打了。我也知道可能会打我们这些小萝卜头。”

血案发生不久，同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悍然武力“接收”劳协重庆分会及工人福利社，劳协干部和工会会员38人被逮捕，史称“八·六事件”。为安全起见，李佩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她向劳协工人福利部主任俞志英（后接替李佩担任朱学范的英文秘书）谈了“八·六事件”的经过，表示应该将此事件作对外宣传。俞志英便按照李佩所谈内容写成英文稿，找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主任汤逊让，由其帮助对外发表。

在上海期间，美国工会负责教育的工作人员把李佩推荐到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1947年2月，李佩赴美留学。留学期间，李佩仍然负责劳协在美国的联络工作。1947年秋，朱学范前往美国，李佩和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协助朱学范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劳协、摧残工会运动的罪行。招待会后，朱学范同李佩进行了深度交谈。交谈中，李佩认为美国产联和美国劳工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战后美苏矛盾日益激化，由于劳协坚决同苏联等进步工会站在一起，美国工会对劳协的态度已经改变。朱学范认为李佩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是比较清醒的。

1948年，李佩在美国与康奈尔大学教授郭永怀结婚。同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劳协加入恢复重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实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和全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

李佩在中国劳动协会5年的工作经历，对其日后与郭永怀一道冲破层层阻力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往事，李佩说道：“1942年我就到了重庆，到我离开重庆的几年中，我是从对政治不太关心，到特别拥护共产党。那几年中发生的问题特别说明问题。”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鲁迅给人的感觉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但鲁迅也有幽默的一面，偶尔还讲个笑话作乐。

一次，鲁迅给身边的人讲笑话：有户人家，父母外出，把10岁的孩子留在家中。有客人来，问：“令尊、令堂上哪儿啦？”孩子不懂令尊、令堂是什么意思，于是眼看着客人而默不作声。

父母回来后，孩子问父亲：“令尊、令堂是什么意思？”父亲怒斥道：“令尊就是我，令堂就是你娘，呆虫！”孩子被训斥得云里雾里，但记住了这三句话。过了几天，父母外出，客人又来问，这次孩子振振有词地回答道：“令尊就是我，令堂就是你娘，呆虫！”客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笑话有些苦涩，它讽喻为人父母，对孩子，岂能只知一味呵斥，而不善教育！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

鲁迅说笑

张雨

联”有些作家患上了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的毛病。一次文艺座谈会，有人请鲁迅先生谈谈这个问题。鲁迅没有发表长篇大论，而只是讲了两个小笑话。

第一个小笑话叫“金扁担”，讲的是有两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有一次，他突然奇想，皇上用什么挑水呢？接着又自己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

第二个小笑话叫“吃柿饼”，说的是一个农妇，一天清晨起来，觉得很饿，她就想，皇后娘娘该是怎样幸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听罢鲁迅讲的笑话后，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无不以为鲁迅先生妙语解说而拍手叫好。

鲁迅讲的笑话，不仅是供人莞尔一笑，而且还包含着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世事的针砭。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经常运用对联这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书育人。

1927年的中国，风刀霜剑，群芳凋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陶行知为了推行“改革全国乡村教育”的主张，告别安逸的教授生活，来到南京北郊神策门外的一个荒凉山庄，创作了晓庄师范。期间，他多次为学校撰写对联，传播教育思想。如在3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那天，会场挂着一副陶行知撰写的对联，融汇了他的教学思想。联曰：“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此联从《三字经》中摘取“马牛羊，鸡犬豕”和“稻粱菽，麦黍稷”嵌于联中，构思巧妙。读来，不仅风趣幽默，更

陶行知撰联

冯忠方

重要的还是蕴涵了他一贯倡导教育改革的宗旨，旗帜鲜明地提倡深入农村、接触社会，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旧教育制度。陶行知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生产、挑粪种地、睡地铺、住牛栏，并以“田汉”自喻。

对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小疑必问，大事必问，才算学生”是告诫学生要加强体育锻炼，认真学习关心时事；“认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好教育；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文明”是鼓励学生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养成动脑动手的好习惯。总之，这些对联明白如话，寓教于乐，却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追求。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赵元任是蜚声海内外的语言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1924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赵元任还精通音律和各种乐器，终身与钢琴为伴，是一位深谙中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大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2岁的赵元任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他在日记中写道：“欧战迫近，何等荒谬！”他满怀愤慨地创作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发表在1915年1月出版的《科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表达了内心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

《和平进行曲》按照西方大小调和声体系与进行曲风格创作而成，赵元任在《自传》中曾提及“它完全属于西洋风格”，是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萌芽时期的一曲模仿之作。尽管该曲曲式短小，技巧简单，但开创了中西方音乐融合的先河，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赵元任作曲

周惠斌

五四运动以后，赵元任积极参与各类音乐活动，曾参加歌剧《阿依达》的指挥和演出，并陆续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风格新颖，音乐形象鲜明，曲调优美流畅。其中，与刘半农合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意境悠长，脍炙人口，穿越时空，传唱至今，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和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卖布谣》《劳动歌》《织布》等作品，堪称中国音乐创作风格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抵抗》《自卫》《儿童前进曲》《中华，我中华》《看，醒狮怒吼》等抗战歌曲，慷慨激昂，催人奋发。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曾由衷地赞誉道：“像（赵元任）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采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都有着独特的见解与成就”，赵元任“是一位能把科学、语言、艺术与人生融为一体，把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体现得那么淋漓尽致的大师”。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他与沈从文因文学结缘。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经常向朱光潜约稿。后来朱光潜主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沈从文是8位编委之一，主要负责审阅小说稿件。朱光潜在家中举办读诗沙龙，也常邀请沈从文参加。

1937年8月12日清晨，沈从文与朱光潜、杨振声等人乔装打扮，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开始了他们的逃难岁月。原本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走了18个小时，到天津站已是半夜。马路两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刺刀枪声，一触即发。沈从文一行人的命，就悬在枪口刀锋之下。面对搜查，沈从文主动将一个面包递过去，里面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流的旅费。

一行人侥幸过关，走到通向法租界的万国桥，可他们没有通行证，也没有亲友接进法租界，后面

沈从文逃难

刘浪

又是阴森恐怖的日本兵。进退两难，只得在桥头露宿。

他们又冷又饿又渴，还有远处轰鸣的枪炮声和日本兵不定时的盘查。沈从文随身带了两个粽子，几人分吃，根本不济事。经过一夜的煎熬，以为天亮就能联系朋友想办法。然而很快得知，电话线断了，打不通。大家彻底失望，面面相觑。好在“天不绝无路之人”（朱光潜语），住在六国饭店的钱端升得到消息，拿了通行证来接。这才暂时化险为夷。

经此一难，沈从文与朱光潜的友谊更加笃定深厚。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曾多次撰文为沈从文仗义执言。他们晚年时常挂念对方的病情，互相鼓励一起多活几年。1986年3月，朱光潜逝世，有两颗心愿未了：一是未见到所翻译的《新科学》出版，二是未能履约那年春天去看望老友沈从文和叶圣陶。

张伯苓的救国教育和“南开精神”

崔鹤同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以“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办校宗旨，以全面展开“德、智、体、美、劳”教育为方针，于1904年创办了南开中学，继而又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最终，使之成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大学，并形成“炸不掉的南开精神”，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奇观。

张伯苓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给了日本，看到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是人的素养不足的问题，从而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要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挺直民族的脊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兴办新式教育，培养出将来救国救亡的栋

此外，他还出任“天津教国会”“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等爱国组织的领导，担负起引领抗日的责任，发送信函和赠送物品鼓励和慰问前线抗日将士。1934年10月，在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手旗标语，并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令当时出席运动会的日本驻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立不安，向张伯苓提出抗议。张伯苓义正词严地回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这样的张伯苓和南开让日本侵略者痛恨。张伯苓也敏锐地察觉到，日寇的